

## 出版前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对外开放、信息技术发展、语言产业繁荣与教育领域改革等对我国外语教育发展和外语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有力推动了我国的外语学术出版。为梳理学科发展脉络，展现前沿研究成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汇聚国内外语学界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精心策划出版“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下文简称“文库”）。

“文库”精选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外国文学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五大方向共25个重要领域100余个核心话题，按一个话题一本书撰写。每本书深入探讨该话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脉络、研究方法和前沿成果，精选经典研究及原创研究案例，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展望。“文库”在整体上具有学术性、体系性、前沿性与引领性，力求做到点面结合、经典与创新结合、国外与国内结合，既有全面的宏观视野，又有深入的细致分析。

“文库”邀请国内外语学科各方向的众多专家学者担任总主编、子系列主编和作者，经三年协力组织与精心写作，自2018年底陆续推出。“文库”已获批“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作为一个开放性大型书系，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出版，并计划进行不定期修订，使之成为外语学科的经典著作。

我们希望“文库”能够为外语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师及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帮助读者清晰、全面地了解各核心话题的发展脉络，并有望开展进一步深入研究。期待“文库”为我国外语学科研究的创新发展与成果传播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年11月

---

##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任：孙有中 王文斌 王克非 文秋芳 张 剑  
委员：蔡金亭 陈 红 刁克利 董燕萍 高一虹 韩宝成  
黄立波 蒋 严 马秋武 秦洪武 司富珍 谭惠娟  
王东风 王立非 徐 浩 许家金 许 钧 杨金才  
袁毓林 张 辉 张 威 朱 磊

---

## “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编委会

总主编：张 剑

传统·现代性·后现代研究系列主编：张 剑

社会·历史研究系列主编：杨金才

种族·后殖民研究系列主编：谭惠娟

自然·性别研究系列主编：陈 红

心理分析·伦理研究系列主编：刁克利



# 目录

|    |     |       |
|----|-----|-------|
| 总序 | 张 剑 | ix    |
| 前言 | 陈 丽 | xviii |

|        |   |
|--------|---|
| 第一章 概说 | 1 |
|--------|---|

---

|              |    |
|--------------|----|
| 1.1 话题源起     | 2  |
| 1.2 空间界说     | 6  |
| 1.2.1 空间与时间  | 8  |
| 1.2.2 空间与地方  | 12 |
| 1.2.3 空间与超空间 | 18 |
| 1.3 当代意义     | 24 |

|           |    |
|-----------|----|
| 第二章 渊源与流变 | 27 |
|-----------|----|

---

|                    |    |
|--------------------|----|
| 2.1 空间的社会属性研究      | 28 |
| 2.1.1 列斐伏尔：空间的社会建构 | 28 |
| 2.1.2 福柯：空间的权力批判   | 32 |
| 2.2 空间理论的文化转向      | 37 |
| 2.2.1 詹明信          | 39 |
| 2.2.2 大卫·哈维        | 46 |
| 2.2.3 霍米·巴巴        | 52 |
| 2.2.4 爱德华·苏贾       | 60 |
| 2.3 空间文学批评的路径与发展   | 65 |

|                                |            |
|--------------------------------|------------|
| 2.3.1 文字绘图：作为绘图员的作家·····       | 66         |
| 2.3.2 空间叙事：叙事学的空间转向·····       | 74         |
| 2.3.3 空间批评：文学批评的新领域·····       | 87         |
| <b>第三章 案例分析(一)：都市体验与空间批评</b>   | <b>102</b> |
| <hr/>                          |            |
| 3.1 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巴黎·····           | 102        |
| 3.1.1 本雅明评波德莱尔的巴黎·····         | 104        |
| 3.1.2 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 109        |
| 3.2 乔伊斯的都柏林·····               | 111        |
| 3.2.1 文学中的地图·····              | 112        |
| 3.2.2 图绘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         | 114        |
| 3.2.3 后殖民文化空间·····             | 117        |
| 3.3 乔伊斯的漫游者·····               | 122        |
| 3.3.1 《都柏林人》中的瘫痪与流动·····       | 123        |
| 3.3.2 终极漫游者：布卢姆·····           | 133        |
| 3.4 小结·····                    | 143        |
| <b>第四章 案例分析(二)：女性主义与空间批评</b>   | <b>145</b> |
| <hr/>                          |            |
| 4.1 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空间·····           | 146        |
| 4.1.1 伍尔夫的家宅·····              | 146        |
| 4.1.2 空间区隔与女性成长·····           | 149        |
| 4.1.3 先锋画派与空间叙事形式·····         | 152        |
| 4.2 两部伍尔夫空间研究新著述评·····         | 155        |
| 4.2.1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房间与现代性空间》····· | 157        |

|                                 |            |
|---------------------------------|------------|
| 4.2.2 《漫步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伦敦：文学地理学研究》… | 165        |
| 4.3 赫斯顿的空间诗学：以《他们眼望上苍》为例 ……     | 173        |
| 4.3.1 门廊 / 房间：赫斯顿的黑人女性空间诉求 ……   | 175        |
| 4.3.2 内 / 外：可以与外表剥离的精神空间……      | 180        |
| 4.3.3 非场所、边缘乌托邦和黑人文化社区 ……       | 184        |
| 4.4 小结 ……                       | 189        |
| <br>                            |            |
| <b>第五章 研究发展趋势与建议</b>            | <b>191</b> |
| <hr/>                           |            |
| 5.1 空间与理论 ……                    | 192        |
| 5.2 空间与叙事 ……                    | 195        |
| 5.3 空间与文本 ……                    | 196        |
| 5.4 空间与非文本……                    | 198        |
| 5.5 相邻研究域 ……                    | 200        |
| <br>                            |            |
| <b>参考文献</b>                     | <b>206</b> |
| <b>推荐文献</b>                     | <b>219</b> |
| <b>索引</b>                       | <b>221</b> |



## 总序

外国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作品译介时代、文学史研究时代和作家+作品研究时代，如果查阅申丹和王邦维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文学理论研究时代。译介外国文学理论的系列丛书大量出版，如“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和“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系列等。在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堂使用较多、影响较大的教程中，中文的有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英文的有张中载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和朱刚主编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这些书籍所介绍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理论，以《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为例，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等。

经过十多年之后，这些理论大多已经被我国的学者消化、吸收，并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应用。有人说，外国文学研究已经离不开理论，离开了理论的批评是不专业、不深刻的印象主义式批评。这话正确与否，我们不予评论，但它至少让我们了解到理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在大多数外国文学研究者心中的分量。许多学术期刊在接受论文时，首先看它的理论，然后看它的研究方法。如果没有通过这两关，那么退稿即是自然

的结果。在学位论文的评阅中，评阅专家同样也会看这两个方面，并且把它们视为论文是否合格的必要条件。这些都促成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理论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承认，中国读者可能有理论消化不良的问题，可能有唯理论马首是瞻的问题。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中，理论和概念可能会被生搬硬套地强加于作品，导致“两张皮”的问题。但是，总体上讲，理论研究时代的到来是一个进步，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索和追寻的方向。

## —

如果说“应用性”是我们这套“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应该仔细考虑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应该如何强化理论的运用，它的路径和方法何在？第二，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的过程中如何体现中国学者的创造性，如何体现中国学者的视角？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十年前，当人们谈论文学理论时，最可能涉及的是某一个宏大的领域，如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等。而现在，人们更加关注的不是这些大概念，而是它们下面的小概念，或者微观概念，比如互文性、主体性、公共领域、异化、身份等等。原因是大概念往往涉及一个领域或者一个方向，它们背后往往包涵许多思想和观点，在实际操作中有尾大不掉的感觉。相反，微观概念在文本解读过程中往往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在分析作品时能帮助人们看到更多的意义，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物、情节、情景，以及这些因素背后的历史、文化、政治、性别缘由。

在英国浪漫派诗歌研究中，这种批评的实例比比皆是。比如莫德·鲍德金（Maud Bodkin）的《诗中的原型模式：想象的心理学研究》（*Archetypal Patterns in Poetry: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Imagination*）就是运用荣格（Carl Jung）的原型理论对英国诗歌传统中出现的模式、叙事结构、人物类型等进行分析。在荣格的理论中，“原型”指古代神话中出

现的某些结构因素，它们已经扎根于西方的集体无意识，在从古至今的西方文学和仪式中不断出现。想象作品的原型能够唤醒沉淀在读者无意识中的原型记忆，使他们对此作品作出相应的反应。鲍德金在书中特别探讨了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的《古水手吟》(*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中的“重生”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 中的“天堂地狱”等叙事结构原型 (Bodkin: 26–89)，认为这些模式、结构、类型在诗歌作品中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自古以来沉淀在西方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呈现 (90–114)。同时她也认为，不但作者在创作时毫无意识地重现原型，而且这些作品对读者的吸引也与集体无意识有关，他们不由自主地对这些原型作出了反应。

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微观概念来分析具体文学作品的趋势就更加明显。大卫·辛普森 (David Simpson) 的《华兹华斯的历史想象：错位的诗歌》(*Wordsworth'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Poetry of Displacement*) 显然运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它凸显的关键词是“历史”，即用社会历史视角来解读威廉·华兹华斯 (William Wordsworth)。在“绪论”中，辛普森批评文学界传统上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对立，将华兹华斯所追寻的“孤独”和“自然”划归到私人领域。实际上，他认为华氏的“孤独”有其“社会”和“历史”层面的含义 (Simpson: 1–4)。辛普森使用了湖区的档案，重建了湖区的真实历史，认为这个地方并不是华兹华斯的逃避场所。在湖区，华氏理想中的农耕社会及其特有的生产方式正在消失。圈地运动改变了家庭式的小生产模式，造成一部分农民与土地分离，也造成了华兹华斯所描写的贫穷和异化。华兹华斯所描写的个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想象力的丧失，似乎都与这些社会的变化和转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84–89)。在具体文本分析中，历史、公共领域、生产模式、异化等概念要比笼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更加有用，更能产生分析效果。

奈杰尔·里斯克 (Nigel Leask) 的《英国浪漫主义作家与东方：帝国焦虑》(*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 Anxieties of Empire*) 探讨了拜

伦 (George Gordon Byron) 的“东方故事诗”中所呈现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 的《阿拉斯特》(*Alastor*) 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 中所呈现的印度, 以及托马斯·德·昆西 (Thomas De Quincey) 的《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 中所呈现的东亚地区的形象。他所使用的理论显然是后殖民理论, 但是全书建构观点的关键概念“焦虑”来自心理学。在心理分析理论中, “焦虑”常常指一种“不安”“不确定”“忧虑”和“混乱”的心理状态, 伴随着强烈的“痛苦”和“被搅扰”的感觉。里斯克认为, 拜伦等人对大英帝国在东方进行的帝国事业持有既反对又支持、时而反对时而支持的复杂心态, 因此他们的态度中存在着焦虑感 (Leask: 2-3)。同时, 他也把“焦虑”概念用于描述英国人对大英帝国征服地区的人们的态度, 即他们因这些东方“他者”对欧洲自我“同一性”的威胁而焦虑。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批评实践, 是用批评理论进行文本分析, 那么拉曼·塞尔登 (Raman Selden) 的《实践理论与阅读文学》(*Practicing Theory and Reading Literature*) 一书值得我们参考借鉴。该书是他先前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的后续作品, 主要是为之前的著作所介绍的批评理论提供一些实际运用的方法和路径, 或者实际操作的范例。在他的范例中, 他凸显了不同理论的关键词, 如关于新批评, 他凸显了“张力”“含混”和“矛盾态度”; 关于俄国形式主义, 他凸显了“陌生化”; 关于结构主义, 他凸显了“二元对立”“叙事语法”和“比喻与换喻”; 关于后结构主义, 他凸显了意义、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 关于新历史主义, 他凸显了主导文化的“遏制”作用;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他凸显了“意识形态”和“狂欢”。

虽然上述系列并不全面,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概念的数量和种类都可能要超过它, 但是它给我们的启示是: 要进行实际的批评实践, 我们必须关注各个批评派别的具体操作方法, 以及它们所使用的具体路径和工具。我们这套“丛书”所凸显的也是“概念”或者“核心话题”, 就是为了

实际操作，为了文本分析。“丛书”所撰写的“核心话题”共分5个子系列，即“传统·现代性·后现代研究”“社会·历史研究”“种族·后殖民研究”“自然·性别研究”“心理分析·伦理研究”，每个子系列选择3—5个最核心的话题，分别撰写成一本书，探讨该话题在国内外的研究脉络、发展演变、经典及原创研究案例等等。通过把这些概念运用于文本分析，达到介绍该批评派别的目的，同时也希望展示这些话题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的作用。

## 二

中国的视角和中国学者的理论创新和超越，是长期困扰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问题，这不是一套书或者一个人能够解决的。外国文学研究界，特别是专注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人甚至批评说，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理论的人好像有很大的学问，其实仅仅就是“二传手”或者“搬运工”，把西方的东西拿来转述一遍。国内文艺理论界普遍存在着“失语症”。这些批评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它警醒我们在理论建构方面不能无所作为，不能仅仅满足于译介西方的东西。但是“失语症”的原因究竟是因为我们缺少话语权，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话语？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都知道，李泽厚是较早受到西方关注的中国现当代本土文艺理论家。在美国权威的文学理论教材《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第二版中，李泽厚的《美学四讲》(*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中的“形式层与原始积淀”(“*The Stratification of Form and Primitive Sedimentation*”)成功入选。这说明中国文艺理论在创新方面并不是没有话语，而是可能缺少话语权。概念化和理论化是新理论创立必不可少的过程，应该说老一辈学者王国维、朱光潜、钱钟书对“意境”的表述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更近时期的学者叶维廉和张隆溪对道家思想在比较文学中的应用也是可以概念化和理论化

的。后两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要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可能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提升，可能也需要中国的学者群体共同努力，去支持、跟进、推动、应用和发挥，以使它们产生应有的影响。

在翻译理论方面，我国的理论创新应该说早于西方。中国是翻译大国，二十世纪是我国翻译活动最活跃的时代，出现了林纾、傅雷、卞之琳、朱生豪等翻译大家，在翻译西方文学和科学著作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中国翻译家提出“信达雅”的时候，西方的翻译理论还未有多少发展。但是西方的学术界和理论界特别擅长把思想概念化和理论化，因此有后来居上的态势。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西方的热门翻译理论概念如“对等”“归化和异化”“明晰化”等等，都没有逃出“信达雅”的范畴。新理论的创立不仅需要新思想，而且还需要一个整理、归纳和升华的过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领域提出的“变异学”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我个人认为，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的另一个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是一件重要而艰难的事情，最难的创新莫过于思维范式的创新，也就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所说的范式(paradigm)的改变。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日心说”是对传统的和基督教的宇宙观的全面颠覆，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是对基督教的“存在的大链条”和“创世说”的全面颠覆，康德(Immanuel Kant)的“唯心主义”学说是对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全面颠覆。这样的范式创新有可能完全推翻以前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中将“范式”称为“范型”或“型构”(episteme)，他认为这些“型构”是一个时代知识生产与话语生产的基础，也是判断这些知识和话语正确或错误的基础(Foucault: xxi-xxiii)。能够改变这种“范式”或“型构”的理论应该就是创新性足够强大的理论。

任何创新都要从整理传统和阅读前人开始，用牛顿(Isaac Newton)的话来说，就是“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福柯曾经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概念，用来分析个人在权利监视下的困境，在国内的学位论文中得到比较广泛的应用，但是这个概念来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福柯还提出了一个“异托邦”(heterotopia)的概念，用来分析文化差异和思维模式的差异，在中国的学术界也很有知名度，但这个概念是由“乌托邦”(utopia)的概念演化而来，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和十六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分析曾经对女性主义和文化批评产生过很大影响，但是它也是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心理分析的改造，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语言观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巧妙结合。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概念常常被运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中，但是它也是对马克思(Karl Marx)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ideology)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巧妙结合。甚至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两个标志性概念“颠覆”(subversion)和“遏制”(containment)也是来自别处，很有可能来自福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或其他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虽然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西方文论的消化和吸收的高峰期已经结束，但对于个人来说，消化和吸收是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也一样，人们也是首先学习、消化和吸收，然后再争取创新和超越，这就是所谓的“弯道超车”。高铁最初不是中国的发明，但是中国通过消化和吸收高铁技术，拓展和革新了这项技术，使我们在应用方面达到了世界前列。同样，中国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延伸至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线上支付等领域，使中国在金融创新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这就是说，创新有多个层面、多个内涵。可以说，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证

据创新、应用创新都是创新。从0到1的创新，或者说从无到有的创新，是最艰难的创新，而从1到2或者从2到3的创新相对容易一些。

我们这套“丛书”也是从消化和吸收开始，兼具**学术性、应用性**：每一本书都是对一个核心话题的理解，既是理论阐释，也是研究方法指南。“丛书”中的每一本基本都遵循如下结构。1) 概说：话题的选择理由、话题的定义(除权威解释外可以包含作者自己的阐释)、话题的当代意义。如果是跨学科话题，还需注重与其他学科理解上的区分。2) 渊源与发展：梳理话题的渊源、历史、发展及变化。作者可以以历史阶段作为分期，也可以以重要思想家作为节点，对整个话题进行阐释。3) 案例一：经典研究案例评析，精选1-2个已有研究案例，并加以点评分析。案例二：原创分析案例。4) 选题建议、趋势展望：提供以该话题视角可能展开的研究选题，同时对该话题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丛书”还兼具**普及性和原创性**：作为研究性综述，“丛书”的每一本都是在一定高度上对某一核心话题的普及，同时也是对该话题的深层次理解。原创案例分析、未来研究选题的建议与展望等都具有原创性。虽然这种原创性只是应用方面的原创，但是它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丛书”旨在增强研究生和年轻学者对核心话题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进一步扩大知识分子的学术视野。“丛书”的出版是连续性的，不指望一次性出齐，随着时间的推移，数量会逐渐上升，最终在规模上和质量上都将成为核心话题研究的必读图书，从而打造出一套外国文学研究经典。

“丛书”的话题将凸显**文学性**：为保证“丛书”成为文学研究核心话题丛书，话题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领域。如果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话题入选，那么它们必须在文学研究领域有相当大的应用价值；对于跨学科话题，必须从文学的视角进行阐释，其原创案例对象应是文学素材。

“丛书”的子系列设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分类常常有一定的难度，常常有难以界定的情况、跨学科的情况、跨类别的情况，但考虑到项目定位和读者期望，对“丛书”进行分类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且要求所分类

别具有一定体系，分类依据也有合理解释。

在西方，著名的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陆续出版过一套名为“新声音”（New Accents）的西方文论丛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个系列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出版了上百种书籍，至今还在延续。我们这套“丛书”也希望能够以不断积累、不断摸索和创新的方式，为中国学者提供一个发展平台，让优秀的思想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呈现和发展，发出中国的声音。“丛书”希望为打造中国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派别、展示中国的视角和观点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剑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年10月

### 参考文献

Bodkin, Maud. *Archetypal Patterns in Poetry: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Imagin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Leask, Nigel. *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 Anxieties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impson, David. *Wordsworth'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Poetry of Displacement*. New

York: Metheun, 1987.

# 前言<sup>1</sup>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前言”两个字的时候，心情是雀跃的，这个持续了两年多的项目终于快要画上句号。本书的写作虽然持续了两年有余，但绝大多数的工作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完成的。我在坚持写作的同时，也与大多数人一样密切关注着疫情的进展：每日更新的确诊病例数字，全民居家的特殊形式，以及随着疫情的传播以各种形式不断刷屏的新闻——有些是关于不同国家之间同气连枝的互助，有些则体现了排外乃至仇外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抬头的趋势。我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体验，正如福柯精辟总结的那样，早已不是历时性的，而是各点联结、错综交互的复杂网络。与此同时，互联网和虚拟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时空压缩和网络化生活方式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感受，我们已经成为电脑和手机终端的一个个节点。我也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空间与边界的重要性，以及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认知世界、图绘世界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使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写作本书的意义，也更加坚定了我完成本书的决心。

近年来，“空间”（space）一词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热门程度使它成为一个几乎不证自明的重要关键词，围绕这个关键词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

1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间视角下的当代爱尔兰小说研究”（16BWW055）的阶段性成果。

出现。然而，这种信息爆炸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信息量太大，角度各异，有些文献甚至彼此矛盾，不仅不能解惑，反而造成了新的认知困难。詹明信以洛杉矶的鸿运大饭店（The Westin Bonaventure Hotel and Suites）为例说明后现代的超空间时，就着重论述了因身陷庞大网络的空间之中而迷失方向的认知困难。作为应对，詹明信提出了“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又译“认知测绘”）的概念，借助美学的构想寻求对于空间和人类自身更为清醒的认识。而我在写作本书时也力图秉承“认知图绘”的思路，希望既为自己也为我的读者解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能够整体把握“空间”这一关键词，同时又知道如何结合自己的兴趣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因而，在设计本书时，我采取了先宏观再细节的方法：先宏观地概述空间转向的要点、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再介绍几位重要学者的理论成果，他们的空间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最后再具体到文学研究上来，结合文学写作、阅读和理论批评讨论空间转向对于具体文学学科的重要影响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指导意义。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对于空间的社会属性的精辟见解以及福柯关于空间的权力关系的理论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他们敏锐地察觉到空间时代的来临，同时以精辟深刻的总结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复杂的空间时代的理论参考。继他们的前瞻性工作之后，詹明信、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苏贾（Edward W. Soja）、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通过理论和研究工作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我们对于空间的认识。如今，对于每一个对空间问题感兴趣并愿意进一步了解的学者而言，这些名字已经成为通往一片未知领域的先期指路标记。然而，即使在通读上述学者的作品之后，还是会有读者对空间批评感到困惑。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理论更多的是一种颠覆性的认识论，而不是一套具有完备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的学术研究体系。空间文学批评的魅力和难处也正在于此。这是一块尚未完全成形、仍然变动不居的学术沃土，学者们需要以诚实的学术态度、开放的研究心态以及开疆辟土的勇气和创新

精神，参与到这一新兴热潮的实践和实验中去。鉴于“空间”一词的宏大性，及其横跨文学、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性质，本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跨学科的内容。但是，为了突出重点，提供更为具体的视角，本书力图站稳文学的立场，一切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空间理论思想对于文学的书写、阅读和批评实践的深刻影响。

近年来，都市体验和女性主义与空间批评交叉的动态地带研究热度较高。在具体的案例分析环节，案例分析(一)便以都市体验与空间批评的交叉为切入点，以城市漫游者为一个贯通性的文学形象，联结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巴黎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都柏林，集中探讨现代都市体验及其在不同语境下的空间意义和变体。案例分析(二)则从女性主义与空间批评的交叉点入手，强调空间问题的性别分层和异化，以英国白人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美国黑人女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为研究对象，通过展示和对读两人的空间思想，探讨女性主义对于女性生存空间诉求的普遍性和内部差异。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策划出版这套“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并感谢主编张剑教授，感谢他们给我这个宝贵的机会将我的研究心得付梓成书，并在整个成书和出版过程中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具体的支持。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敬爱的公公婆婆，没有他们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我不可能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和家庭义务之外还有余力完成这本书的撰写。由于本人精力与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本人文责自负并期待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陈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年5月

“空间”这一关键词既古老又现代。说其古老，是因为空间的概念自古有之，作为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客观存在形式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说其现代，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横扫人文社科领域的各个学科，至今仍然方兴未艾。一时之间，空间、各种“真实和想象的地方”（real-and-imagined places）<sup>1</sup>以及与空间有关的术语——“空间性”（spatiality）、“图绘”（mapping）、“地貌”（topography）、“边疆”（border）、“边界”（boundary）、“越界”（border-crossing）、“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等，在学术理论与批评实践领域的重要性迅速增加，有力地扭转了十九世纪以来时间和历史话语独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在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以及艺术史等诸领域内，空间意识日益凸显，带来了观念和方法论上的深刻革新。同时，地图绘制等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以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为代表的现代地理科技手段的迅速发展，也使得绘图在文学创作和文化生产中不再仅是比喻意义的存在，还成为一个真实可选的途径。

空间转向的理论渊源及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影响，以及空间理论

---

1 语出苏贾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的标题。

与文学批评结合的思路与方法，都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和梳理。鉴于空间术语涵盖范围的庞杂性，本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跨学科的内容，但是文学研究中的空间理论与实践将自始至终是出发点和聚焦点。本书将探讨空间在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渊源，追索其批评实践，力图绘制一幅近年来空间文学批评的地形图，清晰地展示标志性的术语和研究成果，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些关于空间文学批评研究的指南与借鉴。

## 1.1 话题源起

空间与文学的关系自古密切。凡有故事，便有其发生的时与空。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空间的价值被低估<sup>1</sup>，时间及以线性时间为主导的历史进步论在人文社科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菲利普·韦格纳 (Phillip E. Wegner) 曾引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的名句——“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 (莎士比亚：139)——来说明空间长期被贬抑的事实。空间沦为一种静态的、自然的场景或“容器”，而在这个容器里上演的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才是真正的主角：“空间被看成一个空荡荡的容器，其本身了无趣味，真正戏剧性的东西是在其内部上演的历史与人类情欲的真实故事” (Wegner：179)<sup>2</sup>。这种空间观反映了自柏拉图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空

---

1 “空间”一词极难定义，它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名称和翻译，其内涵也不同，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罗伯·希尔兹 (Rob Shields) 对 space 一词所作的词源考证 (Shields, 2006: 147)。中国古代对空间也有着不同于西方体系的理解和定义，已经有学者对此做过研究，可参见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和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不过，本书涉及的空间转向及由此引发的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源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转向，因此，本书的讨论将主要限于西方哲理体系内的空间概念。

2 文中引用部分为本书作者所译，故参引括号内仍保留引用作品作者的原名。本书此类引用参照此做法，不再特别说明。

间阐释传统否认空间的物质性，将其看作均质的空洞载体的倾向。《简明大英百科全书》对空间如此定义：“空间，指无限的三度范围。在空间内，物体存在，事件发生，且均有相对的位置和方向”（转引自郑佰青：90）。这一定义仍然体现出古典哲学将空间当作均质容器的传统态度。

然而，在经历了整个人文学科的空间转向之后，空间的定义以及空间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已经有了颠覆性的发展。研究者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致可以充当一个模糊的时间坐标。战前，多数学科的研究聚焦于时间性的范畴；而战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空间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空间代替时间，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时代特征。福柯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著名演讲精辟地阐述了这种空间转向：

我们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纪的西方，人们普遍迷恋历史，关注其发展和停滞的主题、危机和循环的主题、不断累积的过去的主题，关注数量庞大的亡灵世界，关注令人倍感威胁的全球变冷。……目前这个时代将或许首先是空间的年代。我们正处于一个共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性的时代，一个远近共处的时代，一个并排放置的时代，一个分散杂处的时代。我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体验，与其说是历时发展的漫长一生，不如说是连接各个节点，并将错综复杂的线索编织在一起的一个网络。（Foucault, 1986: 22）<sup>1</sup>

“网络”的空间意象取代了“直线”的时间意象，成为新的空间时代的有力象征，同在性（simultaneity）和并置（juxtaposition）成为新时代的特征。

1 该文为福柯发表于1967年的一个演讲，并未收录到他的著作全集中，后以《另类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的題目于1984年发表，英文翻译版于1986年出版。

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而言，这一空间转向打破了文学创作和阅读过程中传统的时空观念，改变了对空间的理解和研究方法。空间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和“舞台”，也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文本空间和情感空间；空间的社会属性，空间与权力、性别和身体的关系都得到了新的理解和审视。事实上，空间转向并不意味着置换一套全新的理论与方法，而是透过空间被赋予的新的的重要性，重新审视和处理以往只从社会历史角度处理的问题。因而空间文学批评不仅仅关注二十世纪以来的新作品中的问题，它还开拓了新的视角，供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曾被忽视的内容。

目前看来，文学领域内的空间批评——笔者倾向于使用“空间文学批评”这一术语——仍是变动不居的前沿地带。针对这一研究方向有“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空间文学研究”（spatial literary studies）、“地理批评”（geocriticism）、“文学绘图学”（literary cartography）、“文学地理学”（literary geography）、“地缘诗学”（geopoetics）等层出不穷的措辞。这些术语的研究面有很多交叉覆盖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很容易给读者和研究者造成困扰。但反过来，这也说明了该领域的新兴性和开放性，虽然没有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但也给予了研究者莫大的实践自由。从研究内容来说，空间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即探讨西方哲学体系内空间思维的转换对于文学研究理论的启发和引导意义，以及空间如何与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已有的文学和文化理论交叉互动，从而产生更多的理论可能性，同时构建文学的空间批评方法和路径。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近年来一直从事的理论构建工作可作为这方面的范例。二是文本批评实践，也即针对具体文学文本开展的突出其空间问题的文学批评实践，或者借用高文婧的表述，“在文学批评领域内部针对文学文本展开的以空间维度为核心、与空间范畴相关联的文学评论”（高文婧：166）。此类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包括针对文本空间形式的批评和针对文本空间内容的批评。这方面的例子不一而

足，下文将具体介绍，此处不再举例赘述。

正是因为这一新兴领域的开放性，本书将“空间”作为文学理论关键词的学术努力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塔利在其主编的《劳特利奇文学与空间指南》(*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iterature and Space*)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990年出版的《文学研究关键词》(*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一书影响颇广，但其中并没有“空间”、“地方”(place)、“图绘”或“地理”(geography)等词条。而英国著名文化批评家威廉斯较早前出版、被奉为英国非官方文化指南的经典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中也没有收录与空间相关的词汇。这一缺失颇令人吃惊，尤其是考虑到威廉斯在此之前刚刚出版了《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一书，该书是较早从地理和空间角度深入进行文化批评的作品之一，迄今仍是空间文学批评的经典。《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在1983年再版时增加了21个新词条，但其中并没有“空间”或相关词汇。哈维对此深表遗憾，甚至撰写了《作为关键词的空间》(“Space as a Key Word”)<sup>1</sup>一文来弥补这一缺憾，并表示如果威廉斯现在重修《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定会纳入“空间”词条，并将其与“文化”(culture)一样列为“我们语言中最为复杂的词汇之一”(Harvey, 2019: 119)。塔利因而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自豪，认为他主编的《劳特利奇文学与空间指南》作了及时有益的补充，是“空间文学研究领域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杰出的、代表性样例”，也是“未来批评的一个出发点”(Tally, 2017: 5)。

在国内学界，关于“空间”这一关键词的研究文献已有不少，如陆扬的《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刘进的《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空间理论

1 该文作于2004年，是哈维参加学术会议时提交的论文(Harvey, David. “Space as a Key Word.” Paper for Marx and Philosophy Conference, 29 May 2004, Institute of Education, London)，之后收录于其专著中(见Harvey, David.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2006/2019)。

与文学观念》、郑佰青的《空间》、方英的《绘制空间性：空间叙事与空间批评》等，还有不少应用空间理论进行文本批评实践的专著、博士论文和期刊文章等。正如塔利所说，及时的系统梳理和研究不仅能够例证本领域研究工作的繁荣程度，还可以指明新的出发点，方便未来学者更好地探索这一变动不居的新地带。

## 1.2 空间界说

“空间”一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却很难加以定义，其内涵和外延都相当复杂。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古典哲学思想认为空间是一个永恒不变、无形无状的容器，是非物质性的“绝对空间”。在《蒂迈欧篇》( *Timaeus* ) 中，柏拉图试图用科学(数学和几何)的方法来解释宇宙的生成。他认为在天空(heaven)产生之前便有三种存在：实在者(being)、空间和生成者(generation)<sup>1</sup>。

首先，存在着理型<sup>2</sup>，不生不灭；既不容纳他物于自身，也不会进入其他事物中；不可见不可感觉，只能为思想所把握。其次，我们与理型同名并相似的东西，可以感知，被产生，总在运动，来去匆匆；我们通过知觉和信念来把握它们。第三者是空间，不朽而永恒，并作为一切生成物运动变化的场所；感觉无法认识它，而只能靠一种不纯粹的理性推理来认识它；它也很难是信念的对象。说真的，看这

---

1 英文参照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的翻译版本，详见<http://www.gutenberg.org/files/1572/1572.txt>。

2 中文通常将“理型”(εἶδη, ἰδέα)这一概念译为“理念”；英文起初直译为idea，后来发现不通而改译为form(形式)。但在中文中，“形式”一词往往与“内容”对应，并没有“结构”的含义，与柏拉图原义不符，所以谢文郁主张译为“理型”。

个东西就像在梦中看东西似的。我们说，任何事物都得占个地方，地上或空中。对于既不在地上，也不在空中的东西是无法谈论其存在的，所以说像梦一样。然而，它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只是我们无法唤醒我们自己而对它给出真实的说明，诸如对它和其他事物的分别，它和我们醒时看到的诸物有什么相像之处等。（柏拉图：36）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先后用了两个比喻来说明理型、可感物体和空间（载体）。一是家庭的比喻：理型好比父亲，载体好比母亲，可感物体则是他们结合产生的孩子。二是金子的比喻：理型印模在载体上，产生可感物体；这就像金子被铸造为各种各样的可感物体，但本质上它们还是金子，相比各种形状的铸件来说，金子总表现为一，是永恒不变、无形无状的载体。柏拉图开启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空间阐释传统，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康德，尽管整体的哲学体系在不断向前发展，但空间始终被看作一个客观的、同质的载体或者容器。

所谓“空间转向”，指的就是针对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空间阐释传统的转向。简单说来，空间转向就是空间的意义从空到满的赋义过程：空间从早期哲学里永恒不变、无形无状的容器，转变为一个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的复杂场所。

如今，作为一个概念，我们很难用一两句话对“空间”一词加以界定；但是人们日渐意识到空间不仅具有物理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卡瓦拉罗：164）。通过剖析空间与时间、空间与地方、空间与超空间等三组概念，界定和勾勒空间意义的变化过程，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每个话题都无比宏大，难免挂一漏万，但是通过对比和对照，或许可以对空间作出模糊的界定，并展示空间意义不断深化的过程。

## 1.2.1 空间与时间

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因此，时间与空间作为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哲学概念古而有之。上文说过，在西方早期哲学里，空间是永恒不变、无形无状的容器。相对于空间的静止和空洞，时间被认为具有辩证的动态活力，它与发展和进步紧密相连，因而享有崇高的地位。相应地，进步论和历史决定话语在人文社会学科占据主导地位；以线性时间为主导的历史，其发展必然通往更大的自由和人类的进步。在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中，女主人公斯佳丽(Scarlett)经历了惨烈的战争、亲人的死亡和爱人的离弃，然而在小说的末尾，孑然一身、一无所有的她仍然能够用“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来表达她对明天的希望(Mitchell: 1024)，坚信时间会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西方长期以来对时间和进步的迷信可见一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苏贾认为，“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作在批判社会思想方面历史决定论正在崛起而空间观念相应湮没的一个时代”，而这种“去空间化(despatializing)的历史决定论……十分成功地对空间进行了堵塞、贬低和去政治化”，也即以时间为主导的话语掩盖了其下隐藏的空间现实，从而使得“即便是解放的空间实践的可能性也销声匿迹了将近一个世纪”(苏贾: 6)。

时间之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中便有阐述：“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亚里士多德<sup>1</sup>: 30)。文学艺术被看作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而其模仿的客观世界则需要有“一定长度”：情节上有头有尾，时间上有始有终。文字以线性的方式在作者给定的时空中行进，在特定时间内只能有一条叙述线从作者笔下流过。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在现实生活中同时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在同一个时间点展开。假如作者想要表达另外的叙述线，他就只能暂时中断正在进行的叙述，转而拾起另一条叙述线。因而，在很长时间内，时间

1 该引用文献又译为亚里斯多德。

性是文学作品的主流话语。线性时间关系、因果链条、逻辑呈现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叙事特征。虽然偶有倒叙、插叙或“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方式，但总体上并没有打破小说叙事的线性时间流程。作者和读者都在潜意识里将文学定位为时间的艺术，并注重从时间的角度来解读文学作品。

空间转向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打破了线性时间发展观念。二十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破除了人们对时间和进步的迷信，进步的神话开始破灭。十八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条件大幅度改善；但是，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范围的大战对人类文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经过血腥的战争，人类以往对自身进步的信心也开始动摇。当战争结束，人类从战争的重创中回过神来开始重建家园时，废墟以极其醒目的方式显现出“空间”自身无可置疑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乌托邦梦醒，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破碎混乱的现代世界。多变、零散、无序的社会现实瓦解了延续、整体、有序化的传统线性时空观。正如法国利摩日大学教授、著名文学地理学学者伯特兰·韦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所云，“战前居统治地位的时间概念[如今]丧失了大部分的合理性”(Westphal: 14)。战后学界将怀疑的目光投向那些在“理性时代”(Age of Reason)牢不可破的概念，被历史话语遮掩的空间现实开始显现出来，进入评论家和理论家的研究视野。

而在文学艺术领域，时空观念的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大激发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催生出新的创作灵感和艺术理论。因果逻辑决定论和一维的线性时序遭到否定，电影蒙太奇以快速变化、多场景并置的连续影像最为直观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时空结合的叙事方式。小说家们也纷纷摒弃传统小说的叙事连续性，代之以多个空间场景的并置，从关注时间逻辑转为关注空间场景的变化。

而打破时序，在因果联系难为之处，增以特征对应为补充，取事物间的相似、相反、相向、相背、相合、相离、相包、相嵌……等对应关系为心理线索的客观依据，于是，一反小说叙事结构为直线式垄断的局面，交叠式、复合式、放射式等多种形式争奇斗妍，至此，小说的叙事也渐由时间的承接向空间的并列转移。（金健人：15-16）

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一书的“启蒙运动规划的时间和空间”（“The Time and Space of 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一章中，图文并茂地讲述了自中世纪以来西方世界时间观和空间观的演变和重构，为本节的话题提供了极其经典的理论总结，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移步哈维详读。但是，哈维更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理论，并运用它来分析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剖析它们在体现时空压缩方面的审美特征。在这方面，哈维比詹明信更为开放。詹明信的时空理论倾向于把现代主义与时间性，后现代主义与空间性联系起来，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时间性的深度模式，因为“老的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感觉……是一种对时间性，或者说对往昔的一种怅然若失、痛苦回忆的感觉”（詹明信，1997：290），而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性的平面模式。本书后面章节将会谈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新现代主义研究”（new modernist studies）对这一区分的质疑。而哈维并不拘泥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分，更强调用时空压缩的概念来考察空间和时间观念的革命性变化，以及这一变化将如何改变我们再现世界的方式。关于时空压缩的概念，哈维解释如下：

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

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和我们平常向我们自己表达这一事实的方式……，都有利于表明我所想到的这种现象。由于空间显得收缩成了远程通信的一个“地球村”，成了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的一个“宇宙飞船地球”——使用两个熟悉的日常形象化的比喻——由于时间范围缩短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对付我们的空间和时间世界“压缩”的一种势不可挡的感受。（哈维，2003：300）

在哈维看来，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在社会生产、商品流通、消费、金融服务、城市改造等方面的革命性巨变实际上已经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一方面，我们花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大大缩短，世界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状态下各国在经济和生态上高度相互依赖；另一方面，时间割裂成一连串的当下，历史感和未来感削弱，人们拥有的仅仅是现在，“现存就是全部存在”（哈维，2003：300）。拉康最早使用精神分裂症的医学术语来形容能指与所指的言语示意链条的崩溃。詹明信将之转用来指称后现代人因时间概念破裂，无法将过去、现在和将来有机统一的状态。哈维在这里重申了詹明信的这一术语，肯定了后现代的“现存”与过去和未来毫无关联的断裂感（75）。

这两方面加剧“压缩”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审美感受和时空表达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焦虑，同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艺术、文化和政治上的回应。哈维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看作对变化着的空间和时间体验的回应：“变化着的对于空间与时间的体验，与现代主义的诞生及其迷乱地从时空关系的这一边徘徊到另一边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这就是真实情况，那么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空间与时间的一系列新体验的某种回应、是

新一轮的‘时空压缩’的主张，就很值得探讨”（哈维，2003：354）。时空压缩理论是构成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支柱。与此同时，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二十世纪以来的空间与时间观念的变化；它强调了人类（对于变化着的时间和空间的）体验对于审美实践和文化实践的持续影响，揭示了人类体验时空方式的改变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关联，从而提供了理解这些文学和艺术表达的理论框架。

### 1.2.2 空间与地方

空间与地方（又译场所）在各个人文学科的空间理论中都是重要的核心概念，但这两个概念的具体使用却相当令人困惑。一方面是因为这两个概念的中英文近义词众多，英文里的space、place、site、locality、location、loci等均有空间、地方、地点、位置、场所的含义。另一方面，译者在中英文互译的过程中各有不同理解，并没有固定的译法，从而愈加加剧了这种混乱。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空间与地方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区别加以阐释。

对这两个概念的分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两位：段义孚和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他们的核心著述——段义孚的《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和雷尔夫的《地方与无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出版时间相近，而且两位学者的学术观点十分一致，都着重考察人与空间的关系，认为人类的介入使空间变为地方。空间被认为是抽象的地点，不与人类发生社会联系，因而也没有被赋予价值和意义。而一旦空间被赋予意义，它就成了地方。地方是被人类经验创造出来的一个地点。尺寸大小无关紧要，不论是一座城、一个街区还是一间教室都有可能成为地方；重要的是，这个特殊的空间具有人类的行为和经验赋予的意义和价值。段义孚这样总结空间与地方的关系：

在经验中，空间和地方的意义经常相互融合。“空间”比“地方”更为抽象。一开始无法分化的空间，在我们熟悉它并赋予它价值之后就变成了地方。建筑师们讨论地方的空间特性；他们也同样可以讨论空间的场所（地方）特性。“空间”和“地方”的概念相互依存，互为定义。有了地方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我们才意识到空间的开放、自由和威胁；反之亦然。此外，如果我们把空间看作是允许运动（movement）的，那么地方就是停顿（pause）。运动的每一次停顿都使得相应场所有可能被转化为地方。（Tuan: 6）

段义孚以丹麦的卡隆堡宫（Kronborg Castle）为例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城堡不过由石头砌成，但是一旦游客得知这是哈姆雷特（Hamlet）住过的城堡，顿时觉得眼前场景完全改变了，城墙似乎能够低语，庭院也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甚至能够听到哈姆雷特“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的吟诵之声（Tuan: 4）。人类的情感和经验从石头堆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这就是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来源。在段义孚看来，人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赋予抽象空间以意义：一是通过直接和亲近的方式，例如通过感官；另一种则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例如通过符号、艺术等媒介（6）。

雷尔夫对“地方”的理解与段义孚基本一致，区别在于他认为人与地方的关系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而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而允许人冷静地审视与地方的关系。雷尔夫的《地方与无地方性》迄今仍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经典之一。该书以现象学的方式诠释了人的经验，以及此类经验如何成为构建地方感的基础。雷尔夫创造性地使用了“内部性”（insideness）和“外部性”（outsideness）的对立术语来说明地方与身份认同感（identity）的关系。认同感指的是“将某物与其他物区分出来的、持续的同—性（sameness）和统一性（unity）”（Relph: 45）。雷尔夫认为地

方的认同感来自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不同体验。形成地方认同感的三个标志是物理地貌(包括建筑和风景等)、发生的行为(包括经常发生和偶尔发生的行为)和地方的意义(包括价值、重要性等)。这三者不可分割,共同形成地方感。成为内部人就意味着属于该地,与之认同,而越靠近中心这种认同感就越强烈。正是这种认同感将地方标志出来,使其具有一系列独特的物理地貌、行为和价值。内部性和外部性的特点因而对立体现:“如果一个人感觉处于某一地方的内部,他/她就在此处而非彼处,感觉安全而非危险,有所遮蔽而非暴露在外,闲适从容而非心力交瘁”(Seamon & Sowers: 45)。

雷尔夫还在这部著作里首次提出了“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概念,认为在现代和后现代时期,地方的多样化体验和认同感日益受到无地方性的威胁,也即地方感正在变得支离破碎,甚至有被消除的危险。雷尔夫承袭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观点,认为当今世界地方多样性的丧失也是意义的重大丧失。前工业化和手工文化时代以“真实”的姿态创造地方感(authentic place-making),但现在这种姿态已经被一种“非真实”(inauthentic)的姿态取代。雷尔夫以旅游景观、商业带、新城、郊区以及国际风格建筑为例来说明无地方性和非真实的姿态。就像迪士尼乐园,虽然它在全球不断复制,但内部风景大同小异;全世界也正在迅速地迪士尼化,原本特色鲜明的地方正在被一种单调、浅薄、无地方感的平面风景取代。世界各地(尤其是城市)的风景在迅速趋同,而这种风景缺乏深度,只提供浅薄的表面经验。

地方,特别是地方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区别于实证主义地理学的主要概念之一。段义孚和雷尔夫等人的研究挑战了地理学的科学化、实证主义化倾向,转而强调空间与人的直接关联,认为存在的空间强调的是“质”而不是“量”,突显的是意义而不是功能。这一转型正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出现的“心灵主义反抗物质主义、场所主义反抗空间主义的思想运动”相一致(冯雷: 166),体现出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对现实

主义空间观的挑战，强调空间与人的联系，强调空间的地方性或场所性。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的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 The Classic Look at How We Experience Intimate Places*)的先驱意义在这里表露无遗。该书比雷尔夫、段义孚两人的著作早出版20年，书中虽然没有论及“地方”这一术语，但其论述的重点——家宅、抽屉、箱子、柜子、鸟巢、贝壳、角落、缩影和圆等建构出栖居的诗学观的种种“意象”——却暗合了段义孚所论述的“地方”的精髓。

凡是能满足人的生理或精神方面的需求、让人感受到价值存在之处都可以视为地方，其范围远远超出城镇、社区、家和住所。地方可以以真实的物质形式存在，如舒适的扶手椅、老宅基地、家乡、祖国、整个地球，甚至另一个人也可称为地方，例如，母亲对婴儿来说就是在外玩耍后可以回归的地方；也可以以虚拟的形式存在，如绘画、音乐、影视片、文学、舞蹈等，这些虚拟的地方是“情感支撑的丰厚来源”。(宋秀葵：20)

在《空间的诗学》中，巴什拉开宗明义，指出他所研究的是幸福空间的诗学，认为空间并非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载物容器，更是人类意识的幸福栖居之所。我们在变换来去之中转换的不是空间，而是空间的性质。人一旦离开了熟悉的空间，就开始与另一个空间沟通；空间能够启迪灵魂，我们诗意地建构空间，空间也灵性地建构我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对地方概念的兴趣扩展到人文主义地理学之外，对政治、历史、文学等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地方的界定和研究使得空间的心理学、现象学意义得到了承认和重视。1991年，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英译本出版，进一步扩大了这本书的影响力。列斐伏尔同样将空间理解为渗透了人类日常实践意义的物理和社会景观，并革命性地将空间分为三个层面，而不是通常所作

的二元划分。列斐伏尔认为，在“感知空间”（perceived space，日常的可感知空间）和“理念空间”（conceived space，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产生的知识空间）之外，还存在第三空间——“生活空间”（lived space）。生活空间容纳了所有的矛盾空间，是主观性与客观性、抽象与具体等二元矛盾相互遭遇的地方。空间不再仅仅是客体化的物理空间，还可以是非客体化的：既是心理化、意识化、概念化的空间，也是可以被感知、被想象、被表现的空间。

二十世纪末以来，在全球化的框架之下，地方的概念再次成为研究焦点。随着资本和资源的全球流动，国界、海关等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界线已经基本失效。当代空间与全球化紧密相连，具有共时性和跨空间性的特点以及强大的整合空间的能力。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已经模糊，经济空间与文化空间相互交织，国家、民族、文化、资讯、艺术、娱乐在这个技术空间被重新整合。地方一词被赋予了本土、扎根、稳定、束缚等内涵，与全球化的越界、无根、流动、变动不居等特点相对应，从而形成了新的对立概念组：地方/全球、地方性/全球性。

这组概念首先强调了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对立性，因为它们所关注的是不同的存在体验。一方面，地方与身份认同紧密相连。个人与社会群体的文化身份建构基于地方的常规实践与意义。地方与家园的联系被高度建构，成为“乡愁”的寄托之处，提供了全球化变动不居的动态环境下难得的稳定而熟悉的处所，体现出移动的人群在流动和变化中对身份认同的固定性和安全性的渴求。人们对文化身份的想象往往就体现在对地方的想象之中。地方性体现的是本土性、稳定性和高度内生性的惯常实践，与全球化所代表的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以及空间的同质化过程形成对立。另一方面，地方被认为是有界限的，是一个封闭的场地，具有封闭性和束缚性，是流动、开放的空間的对立面。哈维指出了过度强调地方主义的隐患，他将其称为反动的政治，并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抨击这种对于“社群与地方性、场所与地区抵抗”等的过

度关注，认为这会导致人们倒退至地方主义政治：“面对把资本流通的力量普遍化时，它很难阻止滑入眼界狭小、缺乏远见和自我指涉[的境地]。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把我们带回到狭隘的和宗派的政治，尊重他者在这种政治里被分裂者之间竞争的磨难变得支离破碎”（哈维，2003：435）。

哈维因而提出重建地方的思想，他从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视角出发，分析地方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凸显的原因。他一向认为空间是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而资本的流动性和地方的固着性之间构成了紧张关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时空关系重构改变了地方在全球资本积累中的位置。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金融资本的快速流动使得地方不再拥有垄断权力。为了竞争流动资本，各个地方的人们都寄希望于在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性质、文化与生活等各个方面打造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本地特性，以期吸引外部资本；地方建设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就其本质而言，全球化过程就是一个“削平”地方特殊性、不断对地方进行空间剥削和压迫的过程。因而在反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如何使地方的差异和他异性在空间中被生产出来，并得到进一步的重塑与彰显，就显得尤为重要。哈维以威廉斯的小说创作和文化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地方、空间等概念区分的政治性，并在分析地方与资本的关系时引入威廉斯提出的“激进的特殊主义”（militant particularism）概念（Harvey，2001：172），指出地方的特殊性具有政治用途，本质上是一种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势力的抵抗形式：通过重塑地方、彰显地方的差异和他性，人类就能在具体的历史和地理条件下抵制全球化对地方特殊性的消解。

然而有些学者，例如英国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则直接挑战了这种将地方与全球割裂开来的二分法。在《空间、地方与性别》（*Space, Place, and Gender*）一书中，马西提出了“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的概念，认为地方不是根源（root），而是路径（route）；地方并不是有边界的稳固静态存在，而是开放和变动的，而且地方并非只有单一的身份认同，而是“充满了内部冲突”（马西：199）。马

西提出全球地方感这一概念，目的在于消除全球性与地方性在理论上的对立关系，从根本上修正与补充原有的地方理论。总体上看，马西的全球地方感将地方视作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具有丰富内部差异与社会关系的实体。而地方与全球这两个认识论主体通过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相互关联，相互协调，而非绝对对立。因而，我们在建构一个地方的“地方感”或者说寻找当地独特的地方性时，总是要将它与远方联系起来，也即在本地与他乡的比较和联系中寻找地方的特性。马西指出，虽然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这并不会带来地方性的消亡。地方的特殊性被持续地再生产，而且这种特殊性并非源自地方源远流长的、内在化的历史，而是源自地方与远方的独特联系与混合。空间体现为关系网络的延展——“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社会关系，每一个都充满了力量，并且伴随着支配性和从属性的内部结构”（198），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在流动和联结中被放置在不同的位置，文化精英和难民在其移动路线和对自身移动性的把握上必然有所不同。在马西看来，这种全球地方感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理解地方性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正确的角度。

整体来看，空间和地方的含义呈现出多元化、动态化的变化过程，单数的space和place逐渐让位给复数的spaces和places。同时，人在空间中的作用以及与空间的关联得到重视和突显。空间和地方的概念区分，以及全球化时代下地方感的丧失与重新建构，为我们理解地方与身份认同开拓了新的视角。以地方为落脚点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地方从身份认同的决定者变为参与者。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一个永恒的挑战，即如何在强调安稳的归属感的同时避免落入狭隘地方主义的窠臼。

### 1.2.3 空间与超空间

“超空间”（hyperspace）在物理学上指超出普通的三维维度的多维空间；但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超空间另有含义，多与后现代空间以及詹明信等后现代文化批评家联系起来。段义孚、雷尔夫等人对空间和地方/场所

的研究主要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理论为基础，注重主体在空间创造过程中的能动性。而本节将要涉及的列斐伏尔、詹明信、苏贾等学者多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更多地关注空间对于主体的塑造作用。他们对后现代空间的批判更强调从社会文化或者政治经济的角度剖析资本主义空间，并且明确地指向当时资本主义矛盾的集中表现——都市空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城市危机，这是后现代理论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在科技革命、网络通信技术和便利交通条件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借用列斐伏尔的术语，由原先的“空间中事物[的生产]”(things in space)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Lefebvre: 37)。城市区域传统的核心聚集和边缘扩散的效应正在逐步消失，网络化的流动空间得到强化，体现为一种解辖域化的趋向。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生产也引发了一些政治、文化和生态问题。在列斐伏尔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历来重视时间的维度；而列斐伏尔的一大贡献就是将空间维度的探讨提上其研究日程，主张用一种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看待历史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以社会批判的视角，对城市空间生产的形成机制和运作过程进行阐释和批判，促成了社会批判领域的“空间转向”。空间不再被看作地理学的客观对象，而更多地被阐释为一种文化空间，进而被理论化为当代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如今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追溯空间转向的理论批评时常常会溯源到列斐伏尔。黎庶乐这样总结后现代空间的哲学理论谱系：

事实上，整个后现代空间理论发展谱系应该是由列斐伏尔实现的空间转向和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批判开始，经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理性空间的解构而形成的后现代理论逻辑，再到詹姆逊<sup>1</sup>通过延续和

1 即詹明信。

修正二人的理论，从而形成后现代超空间理论。最后，哈维拓展了詹姆斯对超空间的分析，并建构起后现代空间性变化的政治经济学，由此完成了整个后现代空间问题的基本理论框架。(黎庶乐：75-76)

就引文中提到的几个代表人物而言，詹明信与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关系最为密切，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把后现代文化理论引入中国的学者，他对于中国学者的影响也更为深远。相较于其他几位学者，詹明信更倾向于用电影、文学、绘画、建筑等泛文化类的作品来阐释超空间，从而将理论研究从社会领域引入文化领域。

在詹明信看来，后现代空间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相连。这一时期，资本已经脱离生产领域，变为自由浮动的金融资本，转移到非生产领域，例如当今蓬勃发展的股票市场、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等。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空间中，资本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穿越有形的地理空间。物理空间相对于它的文化意义而言已经不再重要。后现代空间不再重视场所性或地域性，因为电视、网络和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超越地理的、全球性的技术空间。

后现代社会衍生出的空间形式是多种空间混合、交织在一起的，不再停留于某一个能用视觉和体积测量的对象。詹明信挪用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关于“超现实”(hyper-reality)的概念，将这种空间称为“超空间”。在鲍德里亚早期消费社会的符号学解读中，物品作为消费对象被剥离了实质性指涉，从而转化为一种符号或符码。鲍德里亚在其媒介批判理论中把电子媒介看作拟真机器，电子信息技术使信息、符码充斥各个角落。城市不再像十九世纪那样是政治—工业的场所，而是符号、传媒和符码的场所。类像(simulacra, 又译拟像、仿像)与现实间的界限消融于内爆(implosion)，模拟的环境变得比真实环境更加真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符码拟真(simulation)的超真实世界。如今盛行的网络虚拟社区便是一个超真实的拟真世界。虚拟社区中的聊天、恋爱，甚

至“结婚生子”，都是建构在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之上的游戏拟真，它比现实还要真实，令参与者沉迷其中，虚实颠倒，真假难辨。

鲍德里亚还以迪士尼乐园为例阐释了这一概念。鲍德里亚认为，迪士尼乐园的空间设计和技术手段处处竭力制造一个完美的梦幻世界，它不是现实却优于现实，鲍德里亚称之为“超现实”。这种梦幻感原本应该凸显其外部世界的真实感，但是鲍德里亚认为它隐藏了外部世界并不“真实”，美国其实就是个迪士尼乐园的事实：“它的设计本意就是一个孩童的世界，目的就是让我们相信成年人生活在别处，在‘真实’的世界里，从而隐藏了这一事实——真正的幼稚遍地都是，尤其存在于那些来乐园的成年人身上，他们来到这里装作孩童，从而避免真正理解自己真实的幼稚程度”（Baudrillard: 172）。

在詹明信看来，超空间就是“一种仿真或拟象，其特有的作用就在于把日常生活周遭的现实世界加以‘非真实化’。在这样的空间里，主体再也没有能力给自身定位，再也没有能力以感官系统组织周围的环境，亦不能通过认知系统测绘自身在外部世界中的位置”（吴琼：59）。主体的空间迷失感（disorientation）是后现代超空间的突出特征。由于连续的时间意识、历史因素从思维和人们的体验中消失，人们更多地停留在现时的体验之中，时间成了无限绵延的现在，转变为空间性的存在。这种新的空间形式把时间的连续性转变为空间上的并列，在横向上切断了与其他符号的联系，在纵向上排除了对深层意义的追问，从而把体验变成孤立的当下体验，体验与体验之间的关系则是偶然的、不确定的。

詹明信以洛杉矶的鸿运大饭店为例来说明后现代的超空间。鸿运大饭店的玻璃幕墙将饭店与周围的城市环境隔离开来，形成了后现代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建筑物与周遭环境粗暴割裂，截然分成两个世界。整个建筑宛如孤岛，遗世独立。而在建筑物的内部，人们很容易失去方位感：出入口的标志模糊，前后、高低的位置感也很混乱，电梯和自动扶梯的使用进一步增加了辨识方位的难度。“你浸淫其中，就完全失去距离感，使你再

不能有透视景物、感受体积的能力，整体人便溶进这样一个‘超级空间’之中”（詹明信，1997：495）。而且詹明信进一步认为，这种失去方位的感觉可以用作一种比喻或象征，来帮助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的超空间以及后现代主义给予我们的感受。

至此，空间范畴终于能够成功地超越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以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知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找到确定自己的位置方向。人的身体和他的周遭环境之间的惊人断裂，可以视为一种比喻、一种象征，它意味着我们当前思维能力是无可作为的。……作为主体，我们只感到重重地被困于其中，无奈力有不逮，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于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如何被困的一点蛛丝马迹。（詹明信，1997：497）

超空间破碎而分裂，具有平面感和无深度感，这无疑给我们的认知、解读和阐释带来了困难。我们身处超空间之中，不仅无法认清空间的结构和方向，因而无法对自己和周遭的环境进行准确定位，同时还面临着更大的威胁——我们的主体性受到威胁，思维和认知也难以有效地应对信息时代庞大复杂的信息网络，极有可能身陷其中而无力自拔。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詹明信提出了“认知图绘”的概念，借助美学构想来寻求对空间和人类自身更为清醒的认识。詹明信认知图绘概念的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凯文·林奇（Kevin A. Lynch）的名著《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和法国著名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林奇在其著作中指出，人们在道路复杂、方向混乱的城市中很难为自己和城市进行总体定位，因而容易迷失，但是人们可以根据先前经验在头脑中构建场景地图，以之为依据来定位自己和周围环境，从而摆脱被动局面。

阿尔都塞也曾提及，意识形态表达了“主体及其真实存在境况之间的想象关系”（转引自詹明信，1997：510）。詹明信发现了林奇与阿尔都塞理论中的相通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认知图绘的概念：认知图绘“使个人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握再现，在特定的境况中表达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可呈现（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詹明信，1997：510）。绘制地图成为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来喻指对事物结构和本质的把握。

詹明信的时空研究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即克服后现代的空间混乱所导致的政治困境。在詹明信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既成事实，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应对它；而认知图绘的概念就是他从空间上定位全球化的尝试。多年后接受中国学者的采访时，詹明信曾这么概括他的认知图绘概念：

如何考虑它，如何想象它，如何从政治上意识到它，如何再现它——这些也许是任何认知测绘的四个方面——或者说一种概念，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形象，一种正在提高或正变得明确的对现象的政治意识，并最后在可能存在或必须创造的情境中寻求再现的方式。于是，在这里，按照这样一种扩展了的认知测绘的概念，人们会发现对一种经济类型的理论认识，对集体主体性的种种分析，对政治行为的质疑，以及对美学的再现的问题。（詹明信<sup>1</sup>，2003：112）

因而，詹明信虽然以时空为视角，但他立足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定时空状况，特别是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变化，来探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经济与文化间的关系。超空间和认知图绘的提出试图从整体上提供一种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和方法，来帮助人们理解这个形象万千、

1 该引用文献又译为詹姆逊。

光怪陆离的世界。

和詹明信的后现代超空间理论相呼应，还有其他学者用不同的措辞表达了类似或相关的思考。例如，福柯笔下扎根现实却又迥异于它所反射的一切场所的“另类空间”或者“异托邦”；苏贾延续列斐伏尔的“第三化”的思路，并借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阿莱夫》(*The Aleph*)所阐释的“第三空间”；巴巴以“杂糅”(hybridity)为特色的后殖民“第三空间”；等等。这些不同的表述虽然各有侧重，但都突出了当代空间的不确定性、包容性和混杂性等诸种特征，本书后文会进一步详述。

袁源在分析詹明信对苏贾和巴巴的理论影响的基础上指出，“这个超空间既是詹明信讨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关键词，也分别为后现代都市研究和后殖民文化理论探讨提供了启示”(袁源：185)。正因如此，本节希望通过对这个重要关键词的评述引入空间更多层次的含义，也为随后的详细研究提供一种更为宏观的视野。

### 1.3 当代意义

我们身处一个高度空间化的社会。自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空间便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对空间的看法不再只限于空荡荡的容器和无生命的地理背景。

空间是生产资料，所有的空间都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空间都有使用价值，并能创造剩余价值；空间可以被消费，可以成为消费的对象，公园和海滨这样的场所，都是被消费的地方；空间是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整个国家都

是由警察控制的空间；最后，空间既是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空间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消费的工具；既是统治的工具，也是抵抗的工具。显然，它处在各类势力的较量之下，并在各类势力的较量中获得自身的现实。……也就是说，社会形成和创造了空间，但又受制于空间，空间反过来形塑着社会构型。社会和空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的辩证关系。（汪民安，2015：102-104）。

不管是哪一领域的空间研究，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都相当重要，因为土地问题、城市建设问题、环境污染和保护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由此而言，空间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而具体到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空间转向已经在许多方面革新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手段。首先，空间的重要性空前上升，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文学中的空间表征，甚至出现从空间的角度重新解读和书写文学史的尝试。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堪称这方面的优秀范例。作为空间批评的早期经典，《乡村与城市》迄今仍是空间文学批评的入门必读之作。该书通过探讨现代英国文学对“乡村”和“城市”两种地域空间的文学再现的变化，展示了对英国文学、文化和社会的深刻的空间批评。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社会中劳动力的分化越来越复杂，阶级关系改变，城市和乡镇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依赖面对面交流的“可知社群”（knowable community）难以为继。威廉斯分析了简·奥斯汀（Jane Austen）、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等人作品中的可知社群，指出乡村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相比城市中的更为明显但也更为复杂，同样处于主导社会关系的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威廉斯的研究启发我们去探寻文学文本如何再现和反映现实生活中空间实践的变化，以及空间如何承载人们的情感和文化结构的变化。

其次，地缘政治素养的提升使人们认识到不同文类、模式和文本形式所能实现的不同作用，从而质疑文学经典，关注原本被压制、被边缘化的声音。詹明信关于“第三世界”<sup>1</sup>文学的研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詹明信认为，评论者常犯的一大错误就是用正典本身的标准来阅读非正典类的文学。要充分理解第三世界文学和文化作品的价值，就必须增强地缘政治意识，突显空间在认识全球文化和社会现实中的作用。关于这些问题，他在电影研究经典《地缘政治审美：世界体系中的电影和空间》（*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中作了充分的说明。

与此同时，空间理论也为文学批评带来了阐释的多重可能，并在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的多重层面产生影响，推动文学创作和研究向前发展。空间与文学研究已有的现代、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多种文学理论产生跨学科交叉和杂糅，通过突显空间的隐喻和重要性，成功站在了文化生产和文化研究的前沿，成为引领当今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力量。空间批评开启了文学的空间性研究的新范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更是方兴未艾，已经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内的热点。无论是在理论话语的建构还是在空间批评的实践应用方面，它都给中外学者留下了充分的弹性空间和创新机会，相比其他已经成熟的文学批评理论具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

1 “第三世界”为旧时提法，但对詹明信而言却是其所处时代的普遍用法，故表述其相关观点时不再作改动。